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起源

赵国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文章力求客观地评价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先驱在批评和理论领域取得的建树。文章首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英国姗姗来迟的文化与社会的根源,即英国缺乏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接下来介绍并分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三位代表性批评家和理论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拉尔夫·福克斯和埃里克·韦斯特的代表作,从中发掘出当代的一些著名学者和批评家经常忽略的批评洞见和理论创新,同时指出他们因时代的局限而具有的思想缺陷。

关键词:英国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众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05(2015)05-0005-08

Origins of British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ZHAO Guo-xin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the earliest British Marxist theorists and critics in the 1930s. It begins with an inquiry into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roots for the lack of a profound Marxist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n Britain which was greatly responsible for the late emergence of British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n it is followed by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ve critical works from the hands of three famous Marxist critics of the period: Christopher Caudwell, Ralph Fox and Alick West. In the due course, it reveals their critical insights and theoretical originalities often neglected by some prominent critics and scholars of present day and points out their intellectual defects due to the limits of the time.

Key words: British left;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mass culture; Western Marxism

一、引言

在欧洲资本主义大国当中,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最为薄弱,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主流知识界几乎与马克思主义绝缘。虽说马克思的后半生是在伦敦度过的,但他的政治活动主要在欧洲

收稿日期:2015-03-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2JYC752047);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WYB010)

作者简介:赵国新,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及英国文学研究。

大陆的政治流亡者之中,对英国学界和劳工运动影响甚微;前者由功利主义主宰,后者受改良主义把持,二者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始终格格不入。在思想上,英国知识分子更青睐本土出产的简单明晰、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天然反感欧洲大陆系统深奥、侧重演绎的唯理主义,尤其敌视日耳曼的抽象思想。在政治上,英国大牌知识分子多有保守主义倾向,即便是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者,也有无法释怀的中世纪情结:缅怀田野牧歌式的旧时光,美化封建宗法秩序,给它披上了“有机社会”的温情面纱,而无视其等级森严、疫病流行的历史现实。在这方面,英国社会主义的两位重要思想先驱:威廉·莫里斯和约翰·罗斯金就是典型代表。他们在谴责工业资本主义残酷无情的同时,不忘追溯既往,回望中世纪传统,以发掘济世良方,这与放眼未来、诉诸于激烈变革而创设理想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大相异趣。流风所及,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往往自动集结于工党麾下,力主改良折衷、阶级调和,走议会制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初的韦布夫妇、萧伯纳、威尔斯等费边社要员,便是突出例证。在这种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英国姗姗来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异军突起,是世易时移、思想不变的结果,是经济大萧条和知识分子激进化的产物。

二、社会和文化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欧陆思想界。在德国和法国的知识界,共产主义成为核心话题,让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心仪不已,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就是此时转向左翼的,然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即便好异思奇的先锋派作家,对共产主义也是置若罔闻,此间的知识分子正一门心思想追捧精神分析,^{[1]16-17}悉心医治一战造成的心理创伤,填补传统价值观毁灭后的思想真空。拥抱弗洛伊德,迷恋非理性,标榜个体主义,逃避社会现实,遁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世界,成为英国知识界的风尚。^{[2]99}

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这种消极无为的思想状态突然发生逆转。以华尔街股市崩盘为先导,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而来,英国也未能幸免,工厂倒闭,商业停滞,狄更斯笔下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景象,在一些地区再度出现,^[3]与此同时,国外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欧洲大战山雨欲来,一些敏锐的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了悲观的预言:西方文明即将走向终结。面对重重危局,英国统治集团先是束手无策,后是昏招迭出,逼反了整整一代中产阶级知识青年。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无法凝聚人心,促成社会共识。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对世界大战的预言,趁势风靡英国思想界,而苏联革命的巨大成功,经济建设的斐然成就,又为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鲜活的样本: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探讨,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可能。在思想界执牛耳的公共知识分子,出身名门世家的约翰·斯特拉齐、费边社的灵魂人物韦布夫妇以及工党的理论权威、伦敦政经学院左派教授哈罗德·拉斯基,开始大力宣扬苏式社会主义,唱衰自由资本主义,引领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社会的舆论潮流。^{[2]43-50}马克思主义议题首次成为英国公共领域的热点,到了30年代末,除个别早期作品,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都已被译成英文。^[4]在这种情势之下,青年知识分子左转成风,涌现了大批左翼青年诗人和作家,也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奥登一代”,这是自弥尔顿、雪莱以来最激进的一批文人,但他们不像弥尔顿和雪莱那样单打独斗,而是以群体面目出现的,并且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熏陶。20世纪20年代盛行的唯美是务、消极避世、描写个人心理的诗歌风格,迅速失势,取而代之的是介入世事、鼓励行动、看重群体效应的文学观念。随着创作的左倾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运而生。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创设之初,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俄苏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是首位系统地探讨文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名著《艺术与社会生活》在30年代的英国被多次印行。普列汉诺夫在书中猛烈抨击“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主张,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这对于当时的英国知识界来说绝对是振聋发聩的新观念,深刻影响了英国首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为他们的批评之作打上了政治功能主义的烙印。正如左翼批评家艾杰尔·雷克沃德所说,“我们越是认识到想象性文学作品深受社会环境的制约,我们就越是迅速地按照我们的‘想象’的指引,去改变社会状

况。”^[5]当然,普列汉诺夫提倡从社会经济问题入手论述文学发展,也给早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带来了经济决定论。

这一时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以《左派评论》为主要思想阵地。这本杂志创刊于1934年10月,虽说它仅存在三年半左右,但其社会影响却不容忽视。到了1935年,它的销量已达到3000份,在英国文学月刊中排在第二位,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即便在二战之后,当左翼运动已经烟消云散之际,其历史回响依然清晰可闻。60年代创刊的《新左派评论》即得名于它,彰显出这段激进传统的思想韧性。《左派评论》刊载的文章多为批评短论,殊少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评点对象多为当代文学,体现出应对现实亟需的急迫感,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编者在发刊词宣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功能:让文学服务于政治,揭露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文学的危害,尤其强调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质和意识形态潜能。

不过,最能代表20世纪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水准和成就的,并不是这本杂志上登载的短章简论,而是与其声气相投的三部研究专著: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幻想与现实》、拉尔夫·福克斯的《小说与人民》、埃里克·韦斯特的《危机与批评》。它们都出版于社会危机最严重的1937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奠定了他们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先驱的历史地位。在这三人当中,考德威尔的思想最为广博深邃,有“英国的卢卡奇”之美誉。^{[1]2}

三、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社会历史与文学形式

考德威尔出身报人世家,中学毕业后投身新闻界,办过航空出版社,写过侦探小说,出版过科普读物。直到1934年,他才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于同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6年底,他远赴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抗击佛朗哥叛军。1937年2月,牺牲于著名的哈拉玛战役。

在他的大量遗著中,最重要的是两部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幻想与现实》和《传奇与现实主义》,另有两部文学散论《一种垂死的文化的研究》和《再论一种垂死的文化》,紧扣时事,政论色彩浓厚,理论价值有限,只有论述劳伦斯和萧伯纳的两篇文章,还常为后人提及。《幻想与现实》于1937年初首发,1946年再版,后来多次重印。全书总共十三章,前七章旨在探讨诗(即文学)的历史起源和时代演变,后六章重在阐述诗学的基本原则;前七章为全书内容的精华,后六章撰写草率,多有自相矛盾和晦涩难解之处。^[6]

考德威尔在诗(文学)的起源、演变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进行了平行比较,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诗起源于憧憬来年五谷丰登的部落节庆仪式;诗的发展与社会分工同步进行;诗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而且在思想风貌和形式技巧上也与社会发展阶段遥相呼应。就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而言,考德威尔的论述是有一定新意的,虽说同时有经济决定论的嫌疑。无论是先前的还是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看待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时,看重的是作品内容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反映和被反映关系,^{[1]20}而考德威尔的独到之处正在于,他还发现,作品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气韵与社会发展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而这一点正是后来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吕西安·戈德曼)研究的重心,就此而言,考德威尔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下面以书中的两个核心章节为例,说明作者是如何在英国文学的演变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建立起同构关系的。

在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渴望摆脱一切封建束缚、无拘无束地从事经济活动,这种大胆放纵、反对任何羁绊的经济诉求和生活态度,造就了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精神:崇尚绝对自由的意识形态。相应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个性鲜明、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物,例如马洛笔下的浮士德和帖木儿,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雷特,他们都带着豪迈之情义无反顾地去完成自我实现。虽然作者把他们放在古代世界,但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表现出现代人的那种睥睨一切的强烈个体主义精神。不过世易时移,文风丕变。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开始

联手共治。在土地贵族面前甘居人后的工业资产阶级,由顾盼自雄变得谨慎务实:人的要求要适度,行为要有所节制,外在的约束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政治上的妥协,幻化为18世纪新古典主义的文学精神:注重“秩序”和崇尚“规范”。亚历山大·蒲柏的诗歌就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体现。诗人推崇理性,讲究辞藻,格律严谨,对仗工整,在考德威尔看来,这种文学现象折射出的是一种无奈的历史事实:在土地贵族卵翼下的英国资产阶级对自由的诉求受到了严格限制。考德威尔的上述论断,即便放在今日,也不算过时。他在外在的社会发展与内在的文学形式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兼具传统文论的社会历史考量与现代文论的形式分析,这对文学史的撰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纠偏某些传统文学史堆砌史料而忽视形式探索的弊病,也有利于克服某些当代文学史大谈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不顾思想语境的偏颇。

《传奇与现实主义: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研究》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出版,是考德威尔的另一部代表作,它基本上承袭了《幻想与现实》的思路,主要探讨了自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文学的形式内容与历史变迁之间的对应关系。诗歌部分与前书多有重复,但作者在探讨英国长篇小说的形式变迁时,却多有创见,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一个重要发现:从18世纪的笛福到19世纪的哈代、吉卜林,英国传统长篇小说的认识论模式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的认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到20世纪初,亨利·詹姆士、康拉德以及乔伊斯的现代主义小说叙事模式又与现代物理学的认识论有着结构上的对应关系。^[7]考德威尔的这一研究思路,与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大家吕西安·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一书中阐发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同出一辙,可以说,考德威尔在此发出了西方马克思文论的先声。

考德威尔的著作最为后人诟病之处在于,有的地方带有经济决定论的色彩,个别论断有生搬硬套之嫌。在笔者看来,他的主要失误不在于,他试图在经济因素和文学作品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原因很简单,在某些文类和作品中,确实存在着这种对应关系,他的主要问题出在,有时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决定文学的方方面面,从而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近代英国文学都是资产阶级文学。例如,他仅仅根据15世纪以来英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把此后的诗歌一概定性为“资本主义诗歌”,这显然有违文学史常识,其实,这一时期的很多田园诗还充斥着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他的论断忽视了历史传统、社会风俗、作者身世、读者接受以及文学演变理路等重要因素,因而显得疏阔不实、简单粗糙。

四、拉尔夫·福克斯:思想史视角下的小说史论

福克斯出身富室,毕业于牛津,深受马克思主义救世情怀的感染,毕业后投身于劳工运动,协助创建英国共产党,成为30年代著名的左翼记者、政论家和史学家。他与考德威尔同年参加西班牙内战,同年牺牲。为了纪念这位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他生前所在的部队被命名为“拉尔夫·福克斯营”;英国共产党把他与献身希腊民族解放事业的拜伦相提并论。

福克斯成名很早,作品题材丰富,以时政性论著为主。《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1933)这本小书是最早揭露和研究英国殖民主义策略的著作,因其视角独到,后来一再出版,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列宁传》(1933)是无数众多的列宁传记中非常出色的一种;《成吉思汗传》是一部不同凡响的史学著述,至今还在重印。他还著有《马克思、恩格斯论爱尔兰问题》(1933)、2卷本的《英国阶级斗争》(1934),此外,他还编有文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思潮》(1935),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论历史唯物主义》(1935)。他的遗作《小说与人民》(1937),对后世影响最大。^[8]

严格来讲,这本200来页的小书既不是小说史也不是小说理论,而是一部小说史论。作者写作此书的初衷是考察分析当代英国小说所面临的困境,并指出破解之道。在他看来,自从19世纪末以来,英国小说就面临着质量和思想双重危机。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导致作家丧失了主体性,唯市场马首是瞻,炮制大量质劣价廉的通俗小说,吸引了大批读者。这些作品内容高度雷同,缺乏透视现实的

力量,毫无思想深度,读后即忘。此外,一战之后,大部分英国作家的哲学观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固然有揭露人物个性的正面作用,但它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导致当代英国小说走向上了歧途,回避广阔的现实生活,专注琐碎的个人心理,丧失了18世纪长篇小说的史诗特色:豪迈不羁的英雄主义抗争精神、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场面。不鉴以往,无以知未来,福克斯回顾和分析了欧洲小说、特别是英国小说的发展历程,以便进一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值得注意的是,福克斯着重探讨的是小说的盛衰与社会思想变迁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不是小说的发展与社会生产方式嬗变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他走的是文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道路,这与考德威尔的研究思路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增添了一个崭新的维度,就此而言,他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普列汉诺夫式经济决定论的思想阴影。

在他看来,小说创作是一桩哲学事业,但凡杰作,无论是《堂吉诃德》《巨人传》《鲁宾孙漂流记》还是《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它们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们具有哲学思想,二流小说的区分即在于此。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遗泽,以洛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为18世纪辉煌一时的英国小说提供了思想养分。他根据哲学立场的分野,把18世纪的小说家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类:以笛福、菲尔丁和斯摩莱特为代表的客观小说家,以理查逊、斯特恩和卢梭为代表的主观小说家。前者受到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熏陶,注重客观地描摹现实世界,很少描写人物的情感或动机,基本不涉及心理活动,相反,主观小说家只描写人物的动机和情感,绝少接触一般社会现象。主观小说在哲学领域也有其对应物,那就是贝克莱的主观主义哲学。贝克莱推翻了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只承认人的主观意识,不承认任何社会现实。客观主义小说与主观主义小说各有其弊端:前者摈弃情感和分析,蔑视个人的主观心理,导致小说缺乏想象,后者集中关注个人的意识,剥夺了小说的史诗性质。

按照他的判断,英国小说发达兴盛的局面在18世纪中叶戛然而止,原因在于,小说家不能正确地观察周围的人与社会,于是就出现了戈尔德史密斯的感伤主义、华尔浦尔虚伪的浪漫主义。新工业时代伟大的小说家瓦特·司各特,也躲进了理想化和浪漫化的过去。他在历史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男女,而是理想中的人物,寄托了他对英国上层资产阶级和商业贵族的期许。

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自由严重退化,在政治和性生活方面忌讳尤其多,小说创作面临种种清规戒律。福楼拜在1857年曾因猥亵描写受审,然而,就在一百年前,菲尔丁以《大伟人江奈生传》影射时任首相而安然无恙。既然没有胆气表现人与世界之间的真实关系,19世纪的作家只好刻意回避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真相:下层社会的贫困无助、宪章运动、新港叛乱、崇拜金钱、工厂发达、农村凋敝,贪得无厌的功利主义。

此外,读者群体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18世纪的先辈之所以能够坦诚地描写社会生活,无论是物质生活、法律道德、爱情还是战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读者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人物。这些人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稳固,可以承受小说家的挖苦讽刺。而19世纪小说家的读者多是中下层阶级,受教育程度不高,容易受到煽动,不宜透露给他们过多社会真相。

从19世纪后30年以至于当前时代,小说家放弃了个性和“英雄”人物的塑造,描写平常环境中平凡的人,不再突出个性和“英雄”。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杰作中,主人公大都是先和社会相争、最终被征服而后彻底幻灭的青年。随着个性和英雄的消失,小说的史诗性质也毁灭了,情节冲突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挣扎、两性的纠葛或抽象的议论。

以上就是福克斯对英国小说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有鉴于上述英国小说面临的危机,他提供的解决办法是,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描写那种努力改变环境、支配生活、适应历史趋势,并且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像反法西斯斗士季米特罗夫这样的人物,以此来找回小说的英雄人物和史诗性质。

福克斯这番论述中蕴藏有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见解,其中一些观点现在看来稀松平常,但当年却是新知灼见。他对流行小说的分析批评,与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政治批判如出一辙,开启了

后世大众文化批判的先河,与当年同样敌视流行文化的 F. R. 利维斯等人相比,他的批评摆脱了肤浅的道德谴责,揭示出流行小说与资本主义文化消费的紧密关系,凸显出社会历史的厚重和深度。18世纪英国小说与17世纪英国哲学之间的隐秘关系,是他的一个重要发现,令人耳目一新,为马克思主义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那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探讨小说的起源和发展。他指责现代主义小说不再描写“英雄”人物,丧失了史诗性质,这在今日是老生之谈,但在当时现代主义小说大行其道、拥趸甚众之际,可谓新颖之见,警世之言。在这方面,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乔治·卢卡奇的看法有一致之处,卢卡奇一直批判现代主义小说执着于个人感受,而疏于表现社会总体状况,虽说二者之间并无相互影响的迹象和机缘。

由于时代局限,书中也有一些粗糙的论断,甚至还有与事实不符之处。首先,他夸大了精神分析对英国小说创作的影响。其实,一战之后的英国现代主义小说转向探讨个人心理,主要与社会环境和思潮变化有关。疯狂的爱国主义鼓动、伤亡惨重的战争后果,导致世人开始怀疑理性,看重无意识,摈弃历史进步论,对人类的未来悲观绝望,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分析只是推波助澜而已,并非最终决定因素,例如, D. H. 劳伦斯的作品与精神分析理论多有暗合之处,但他还写过两本小册子与弗洛伊德公开论战。其次,18世纪英国小说家人数众多,风格多样,但在他笔下,仅仅有主观和客观小说家两类,这种划分方式显得相当简单武断,例如,简·奥斯丁的小说中既有个人情感,又有社会风俗,很难断定它们专属于哪一种分类。再次,他看出了19世纪英国小说深受禁欲主义束缚,在性描写方面远不如18世纪小说那么大胆直接,但他的解释不够明确和全面。其实,禁欲主义之所以在19世纪盛极一时,原因不一而足,这里仅列举最主要三种:法国大革命的冲击,福音主义开启的宗教复兴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需要。英国福音主义肇始于18世纪,主要宣扬的是信仰虔诚、德性培养和救济困苦,在1789年之前,应者寥寥,传播缓慢,但在法国革命爆发后,却大行其道。^[9]英国统治阶级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会受到海峡对岸雅各宾派学说的威胁,同时他们也看到,法国贵族因一味追求享乐、玩世不恭、无视底层痛苦而被断头斩首,于是,他们便援引福音主义为思想武器,一方面去抗衡无神论色彩浓厚的法国革命,另一方面约束自己的骄奢淫逸,以缓和阶级矛盾。^[10]1815年法国革命被绞杀后,福音主义又开始执行新的历史使命。它所倡导的个体主义、自立精神和勤俭节制等价值观,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成为冉冉上升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精神支柱。在福音主义的道德压力下,原本思想宽松、管理松懈的英国国教也开始收紧教义,板起面孔,上行下效,整个社会变得虔诚严肃,禁欲主义应运而生。再次,他对19世纪英国小说贬低过甚,有失公允,其实,无论在形式技巧方面还是在批判社会现实方面,19世纪英国小说远在18世纪小说之上。最后,他大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在苏联蜕变为主题先行的创作教条,它要求作家反映英雄事迹的崇高精神和勾画未来的宏伟蓝图,这样一来,极力美化社会现实、构建理想世界的“遵命文学”也就应运而生,现实主义的初衷变成了浪漫主义的结局,这绝对是福克斯始料未及的。

五、埃里克·韦斯特:文学批评的政治功能

埃里克·韦斯特出生在伦敦郊区的一个牧师家庭。大学毕业后,到瑞士当私人教师,读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后,深感震撼,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持续性。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期间,他首次接触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后经友人介绍加入英国共产党。1935年,他放弃了大学教职,加入英国共产党,在工人夜校讲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考德威尔曾是他班上的学生。在30年代,他参与组织名重一时的左翼读书会,专门负责作家与读者小组,50年代后到大学任教,1972年去世。他的著述不多,专著有《危机与批评》(1937)、《掉在费边社堆里的好人》(1950)、论文集《阳光下的山脉》(1958),晚年出版的自传《一个人在他的时代》(1969)详细记载了他的心路历程和政治活动。

《危机与批评》是他的代表作,仅100多页,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追溯了17世纪以来英

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概况,重点评价了浪漫派(尤其是科尔律治)的成就得失,总结了艾略特、赫伯特·里德和瑞恰慈等当代批评家的思想特征,中间部分属于文学理论,重在论述语言、声律、惯用语等形式因素在文学中的作用,最后一部分属于批评实践,作者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了当代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全书最精彩的地方是,他对英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回顾,以及他对当代文学批评总体特征的分析。^[11]按照他的归纳,17世纪的文学批评注重探讨文学作品与作家个人的思想关系,大量运用“巧智”“理性”等术语,18世纪的批评家喜欢探讨文学与某种抽象的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动辄使用“哥特式”之类的概念,到了19世纪,浪漫派批评家开始把文学创作与更广阔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而当代的英国文学批评呈现新的特征:不再认为个性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否认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理由是它缺乏审美的考量。以前的文学批评都把诗歌当作诗人自我的心声,但当代文学批评却极力贬低作者个人的力量,主张诗人应在作品中极力泯灭自我,艾略特的文论名篇《传统与个人才能》即是明证,其他批评名家如赫伯特·里德和 I. A. 瑞恰慈也有这方面的倾向。这样一来,文学的创作过程开始与“传统”“心理”等略显神秘的超验过程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具体的人的社会实践发生关系。韦斯特认为,这种理论实际上起源于浪漫派文论,现代批评保留并强化了浪漫派美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宗教内容,抛弃了浪漫派批评家探索文学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关系的做法,当然,他们也顺便抛弃了前者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

在这里,韦斯特显示出独到的批评眼光,他在文学批评史上首次指出,英国浪漫主义批评中蕴含着反抗工业资本主义的思想逆流。他以实例说明,浪漫派批评家早就看出,艺术美是由社会关系构成的,而社会关系中又孕育着矛盾和冲突,艺术可以调节社会冲突,诗歌应当发出人类反抗压迫、追求社会公正之声。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常常乐道于雷蒙·威廉斯在《文化社会》的“浪漫派艺术家”一章中的相关论述,其实,韦斯特的发现要比威廉斯早20多年。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浪漫派的这份政治遗产遭到了批评界的抵制和摒弃。19世纪40年代的宪章运动将浪漫派反对资本主义的冲动落实为社会行动,随着这场工人运动的失败,浪漫派提出的文学生产具有社会特性的主张受到批评界的压制。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自由人文主义批评的始祖马修·阿诺德。阿诺德因恐惧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而主张文学批评要重视诗歌(文学)的形式特征,忽略其社会内容;面对宗教的式微,他提出以诗歌取而代之,借以抚慰人们的心灵,这种举措折射出他深远的政治心机:用文学去弥合阶级分化造成的社会心理伤痕。韦斯特对文学批评发挥文化政治功能的揭秘之举,为方兴未艾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新左派批评家有意或无意地袭用了韦斯特的研究思路,考察了自阿诺德以来直到瑞恰慈和利维斯的英国文学批评,是如何打着客观中正的幌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服务于大英帝国的内外政策。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12]、克里斯·鲍迪克的《英国文学批评的社会使命》^[13]以及帕梅拉·麦考勒姆的《文学与方法》^[14]无不采用这种研究路径,虽说它们都没有提及韦斯特的名字,但影响的痕迹还是清晰可见。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审美特征这个问题上,韦斯特的研究可谓功过互见。他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要发掘文学作品中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也要重视其审美价值,这既是在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也是在反驳自由派批评家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无视文学的美学效果;但另一方面,他令人匪夷所思地提出,判断作品的美学价值,要根据文学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在他眼里,马克思主义判断文学高下的标准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这就极度简化了异常复杂的审美问题,让视域宏阔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变得目光短浅、格局狭隘,其实,道理很简单:有多少经典杰作,并无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之功,但美学价值不低,T. S. 艾略特的颓废诗篇《荒原》即为显例,也有一些颇能鼓动人心的应时之作,大大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但思想肤浅、技巧简单,美学价值不高,斯陀夫人的废奴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即为典型。

六、结 语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起源之际,正值英国社会动荡不安之时,现实政治的急需,文化环境的封闭,思想积淀的困乏,让第一代马克思批评家无瑕深思,从容运笔,从而就不可避免地露出论证粗疏、观点武断的弊端,招致后世学者的詈议。雷内·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简要地介绍完考德威尔其人其作,便含蓄地批评说,“时隔多年之后,较为高深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才在英国扎根”,^[15]特里·伊格尔顿直截了当地说,“除了反面教训之外,他(考德威尔)身上几乎没什么可学的”;^[16]他干脆指出60年代之前英国还存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一章中,除了大加挞伐他们的经济决定论,嘲讽他们以文学改变现实的浪漫情怀,对他们没有丝毫的正面评价。^[17]其实,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有攻击一点而不计其余的弊端,严重忽视了他们的原创性。正如前文所述,他们的著作内容是瑕瑜互见的,既有简单狭隘的荒谬之论,也不乏启迪心智的烛照之见,尤其是考德威尔,他在很多方面都预示出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视角和思路,显示出惊人的洞察力。

参考文献:

- [1] CHRISTOPHER PAWLING. Christopher Caudwell: Toward a Dialectical Theory of Literature[M]. London: Macmillan, 1989.
- [2] NEAL WOOD. Com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M].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59.
- [3] NORMAN PAGE. The Thirties in Britain[M]. London: Macmillan, 1990: 30.
- [4] CHARLES ELKINS.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oward a Genetic-Functional Ap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4: 314.
- [5] DAVID MARGOLIES. Left Review and Left Literary Theory: Culture and Crisis in Britain in the Thirties[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9: 67.
- [6]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 幻想与现实: 诗歌起源研究[M]//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 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 陆建德, 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 [7]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 传奇与现实主义: 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研究[M]//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 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 陆建德, 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333-374.
- [8] 福克斯. 小说与人民[M]. 何家槐, 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75.
- [9] 克莱顿·罗伯茨. 英国史: 下册[M]. 潘兴明,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3: 112.
- [10] G M TREVELYAN. Illustrated English Social History: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London: Longmans, 1952: 28.
- [11] ALICK WEST. Crisis and Criticism and other Literary Essays[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5: 17-74.
- [12]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 [13] CHRIS BALDICK. The Social Mission of English Critic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4] PAMELA MCCALLUM. Literature and Method: Towards a Critique of I. A. Richards, T. S. Eliot and F. R. Leavis[M]. Dublin: Humanities Press, 1983.
- [15] 雷内·韦勒克. 近代文学批评史: 第五卷[M]. 杨自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226.
- [16]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21.
- [17]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1.